

〔埃及〕巴哈·塔希尔 著
向培科 译

爱在流放地

天刚亮，一切都结束了。我是说，难民营里的一切都完了，房屋、人和其他的一切。当我在清晨走出诊所，我已经不认识那个地方了。没倒塌的房屋仍然在燃烧，倒塌了的房屋冒出火苗和黑烟。有些人在废墟中寻找他们的亲人或亲人的尸体。他们跟我一样不停地咳嗽。除了咳嗽声、呻吟声，听不到别的声音。可是，你不知道声音源于何处，是从未倒塌的房屋中传出来的，还是从房屋的废墟中传出来的。地上到处都是尸体和残肢断臂……



重庆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爱在流放地

〔埃及〕巴哈·塔希尔 著
向培科 译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在流放地 / (埃及) 巴哈·塔希尔著; 向培科译.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075-4882-2

I. ①爱… II. ①巴… ②向… III. ①长篇小说—埃及—现代 IV. ①I4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8492号

爱在流放地

作 者: [埃及] 巴哈·塔希尔

译 者: 向培科

策 划: 杨 平

责任编辑: 杨 宁 郭俊萍

特邀编辑: 余菊芳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ubs.com.cn>

电子信箱: silkroadlibrary@qq.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70

责任编辑 010-5833625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882-2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要人物 / 001

第一章 记者会上邂逅 / 003

第二章 遥远的过去死了 / 017

第三章 今晚我要说话 / 037

第四章 一只脆弱的蝴蝶 / 053

第五章 你真美 / 069

第六章 鼓声中吟诗 / 087

第七章 迷人公园里的温馨之夜 / 113

第八章 让今天慢慢过去 / 125

第九章 这是爱的洞穴 / 149

第十章 全世界的孩子们 / 169

第十一章 屹立的山 / 185

主要人物

“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开罗某报社常驻欧洲某城市的记者。

麦娜——“我”的妻子，后离婚。

哈立德、哈纳蒂——“我”和麦娜的儿子和女儿。儿子在上大学，女儿在上初中。

纳赛尔——埃及“七二三革命”领导人，埃及前总统。

萨达特——纳赛尔总统的继承人，埃及前总统。

阿连德——智利前总统，“1973年军事政变”后被杀害。

穆勒尔——医生，当地“国际医生人权委员会”的发起人。

伯蕾吉蒂·希弗尔——小说中的女主角。“我”的情人，导游小姐。

彼德罗·伊巴尼兹——智利政变后的受害者之一。

易卜拉欣·艾勒·麦哈拉维——记者，“我”的旧友，后在贝鲁特某个抵抗运动组织机关报社工作。

夏蒂娅——易卜拉欣之妻，后离婚。

伯尔纳——记者，当地《前进报》主编。

优素福——从埃及逃亡出来的大学生，后在当地一家咖啡店打工，与咖啡店老板娘结婚。

哈米德·埃米尔——海湾某国王的小兄弟，在欧洲从事商业和政治活动。

第一章 记者会上邂逅

我爱上了她，无可奈何地爱上了她，迷上了她……

她年轻漂亮，而我已是一个老头，孩子的父亲，离了婚的人。原本，我脑子里没有爱的念头，也没有任何试图表达对她的痴迷的举动。

她后来对我说：“你的双眼流露了那份爱。”

我是开罗市人，被迫离家出走，到了陌生的北方。在这个地方，她跟我一样，是个异乡的外国女人、一个欧洲人。按照她的旅行护照，整个欧洲就是她的家乡。当我为生计奔走在这个城市时，我们邂逅，成了朋友。

我滞留在这里是为了工作吗？鬼话。其实，我在此无所事事。我不过是为开罗的一份日报写点儿稿子，可我写不写稿子对她无所谓，她在意的是我给不给她写信。

一天中午，在整天疲于奔命的人们的午餐间隙，我俩一起坐下来喝咖啡。她向我介绍自己，我也向她介绍我自己。我们从咖啡店的玻璃窗眺望远处蜿蜒的群山和鳄鱼尾巴似的河岸，彼此的沉默寡言使们的心更贴近了。

我爱上她之后，变成了一个爱唠叨的人。我以话语为盾牌，使自

己内心的真情不露声色。我空话连篇，没头没尾，却乐在其中，像是爱得疯狂，我不能自己。

也许——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当时是无意识地用话语编织了一个网，把她网在其中。她睁大漂亮的双眼盯着我，微笑着问道：“你的话怎么那么多？我的职业就是说话，而你的话比我还多。”

但是，在那个中午，我太无能。话语的网子破碎了。结果是长时间的沉默无语。我眼望着远处的河流，她低着头，用手在托盘里转动喝光了的咖啡杯。我眼前是她浓密的秀发和挺直的鼻梁。我无话可说时，她会突然抬头看着我说：“还有呢？说吧。”而我却无言以对。

在咖啡店外，我们朝停车的角落走去。我将开车把她送到她的办公楼前，然后离开她，装着去上班。

我们走到车子跟前时，她说：“我想再走走，行吗？”

她在我身旁慢慢地走着，一反常态。没走几步她就站住了，语气坚定地说：“听我说，我不想再见到你。请你原谅我，但愿我们没有这次的邂逅。我想，我已经爱上了你。我真的不希望这样。我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我真不希望是这样子的。”

我明白她的意思，沉默了一会儿说：“随你的便。”随后我盯着她匆匆离我而去。

然而，这并不只是个开头。

开始时，事情并非如此。那时候，我常常参加记者招待会。我事先就知道，我无论写什么，开罗的报纸都不会发表的。即使能登出些东西，也会大加删改，变动段落次序，使读者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就想，今天埃及飞机又会载着某位官员到本市来，也许会是某位部长。我若讨好主编，主编会把它发表在头版位置，部长也会对我满意……部长会宣布，“我国经济已经走出困境。我们将为更大更快地发展，研究同欧洲的合作……”汽车转上了机场路……主

编对这突飞猛进的发展兴高采烈，每周都有追踪报道。多年以来，国家突飞猛进，不断地突破困境，主编又怎能不高兴呢？

汽车转上了机场路。我为什么在这个夏日美丽的早晨去参加这个倒霉的记者会呢？难道我真的是交好运的人吗？是麦娜常常说的那种人？我为什么会去机场呢？谁说某部长会来？谁说主编在等我的报道？我最好完全沉默不语。那时，我将谅解他那些烦人的道歉：“主啊！报道晚了。”或者说，“我们刊印了报道，主编在最后‘吃’掉了它！”或者说，“你知道吗？我在对外部调查了，根本没把报道转交给我。真的，我调查了……”如此，等等。我干吗去折腾主编还折磨我自己？反正每月的工薪不会不给，这是重要的。让我们尽情地享受美好的日子吧！

我把车开进了路边的高地，穿过一片丛林，面对机场。

我离开铺砌良好的大街，钻进了林间小道，待在浓荫下。丛林湿润、寂静，新的叶芽刚刚开始覆盖树枝，一片葱茏翠色，似乎是透明的。小树簇拥在土包之上，嫩芽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着。阳光从枝丫间隙穿过。金黄色的光束在青草上游动，忽而消散，忽而显现，光束照亮了遍地的野花，有黄的、有白的，它们装点着夏日的大地。当我们第一次在周末旅行中去保加利亚时，我曾为大地的斑斓景色陶醉，像为麦娜陶醉一样。在丛林中，麦娜问我：“这些花不允许采摘吗？”我说：“不会吧。”于是，她摘了一束花，色彩多样。我端详着她手中的花束，听她失望地说：“这些花长在大地上是何等的美丽！”我发现她手中的花束果然已经没有了生气，枯萎了。花枝虽然还在黄色花朵的簇拥之中，但它显得瘦弱，已经蔫倒在她手的两边。我对她说：“我觉得野花只能生长在野地里。”我抓过枯萎的花束，把它抛向远处。只有一朵最大的黄花留在她的手中，伴着绿叶。我把它插进麦娜的秀发中。我说：“这下你就更美了。”真的，一朵黄花点缀在她乌黑的秀发中，她看起来的确很美、很美。我吻了她，我们都幸福地大笑起来。这是我们第

一次避开人们的视线在丛林中散步。晚上，我们在旅馆里，我吻她就一定要付出代价了。在她脑子里的某个奇怪的角落里，她一直保持着一些鬼点子！当晚她半开玩笑地问我：“你过去是否曾经追着我来到欧洲？”我顺着她的口气说：“是呀，好多次了，来执行秘密的使命。你为什么问这个？”她说：“阁下怎么能知道这些花只能生长在野地里？”我闭口不答。可是无济于事，她玩笑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她说：“你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同人们交往？”

“什么方式？”

“这种只对宾馆、食堂、商店工作人员和一般的人才用的方式。你是不是一个包工头？”

“麦娜，你是否知道我在埃及跟人们打交道的方式？”

她紧咬双唇，左右摇头，好像她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会有新的判断。她说：“不知道，但是在此地，我知道……”

我想回答她，但我还是忍住了。我说：“也许你是对的。我要反省一下。”我很早以前就学会了平息她不明显的怒气。我……够了！公平一点儿吧，她也一直在抚平我不明显的怒气。问题不是那些野花，问题究竟在哪儿？难道事情一开始就错了？什么错？我记得，当初我爱她，她说她也爱我。我是说，她一定在某个时候爱过我，否则，我们怎么会结婚呢？她来我们报社的时候，穷得很，是一个最穷最穷的姑娘，想跟她结婚的编辑排成队。

她常带着靓丽的微笑，双眼盯着跟她说话的人的眼睛。她坦诚的话语俘虏了大家，更俘虏了我。我总是费尽力气保持平常的说话方式，跟她说话，跟女编辑们说话，把眼光移到宽敞的编辑室中的别的地方。她却故意从她的办公桌走到我的办公桌前，向我咨询某件事，像个老同事那样，研究她写的题材。或者，她在文稿交印之前，让我再读一遍她写的文章。接着，她便没话找话跟我讨论家庭问题的方方面面：

她家的人坚持要她结婚，把她当作一件商品介绍给登门求婚的人。她决定一辈子也不以这种方式出嫁。她要自己找对象。为什么只有男人有自己择偶的权利？……她的话使我震惊。我心里想：假如她选择了我，可别对我这么坦率！但是，我克制着，继续与她交谈。

当我们手拉手在滨河大道上漫步时，她大笑着对我说：“妈妈对我说，除了这个破落户，你就找不到别的记者了？为了他，连军官和博士都放弃了？”麦娜使劲掐了一下我的手，自豪地说出这番话。当时我着实吃惊了。“妈妈喜欢你，愿意有你这个女婿。”许久以前，我就知道她妈妈是个关键人物。我第一次见到他爸，我就喜欢他了。他朴实、友善。但是麦娜却有点儿不快，她觉得父亲在场让她蒙羞。我当时还在求婚，坐在门厅里，她父亲却穿着睡衣或长袍就坐下了，十分自豪地赞扬他的老板，还说他下班时怎么买了一个西瓜。卖瓜的人说，这是个又脆又甜的好瓜，可是他回家后切开瓜一看，原来是个白瓢生瓜。于是，马上就把瓜拿回去退还给那个骗子。因为爸爸是个维护自身权利的人，他不允许别人嘲弄他。麦娜听父亲说起自己的种种故事的时候，脸就会紧绷着，臊得通红。我看出了她母亲眼中责备的神情。我们结婚以后，她母亲竟当着我的面打她丈夫。父亲的作为也使麦娜痛苦地流泪，因为他退休之后，已经习惯穿着大袍上街，同理发师傅、蔬菜店老板或者看门人闲聊，坐上几小时。她满眼泪珠地斥责她爸，说：“爸，你太不应该了，别这样了，听我们的吧！”于是，她爸胆怯地表示愿意向她保证下不为例。爸爸去世时，麦娜痛不欲生。连续几个月，她一直两眼泪汪汪的，面对她爸爸的遗像闲话，好像她爸仍然跟家里人在一起。她询问他的近况，问他为什么扔下她就走了，难道就一点儿也不想她了，不爱她了？我心里说：除了悲伤，这难道不是良心的谴责吗？后来证实了我的怀疑。她开始谈论起她的父亲了。她父亲原来是办公室同仁很敬重的个性极强的一个人。他坚忍、坚持真理，他一

生都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她对此深信不疑。有时候，她要求我学习她父亲坚忍不拔的精神。

当我被迫离职、无所事事时，她注意到我有一次理完发也在理发馆待了好长时间，和理发师唠叨个没完，漫无边际。当时我感到恐惧，立刻回家，坐在办公桌前，考虑我的写书计划。但是麦娜后来开始变了，变得很像她妈妈。她责备我宠爱两个孩子。可是，假如我真的要惩罚两个孩子之中的任何一个，她又会生我的气。她会站出来为孩子辩护。结果，惩罚往往针对她自己。我们周五出游归来，总会发现某个孩子出点儿什么错，或两个孩子一起犯了什么错，表现“不懂礼貌”，她便惩罚他们，不给零花钱，不许外出串门。假如我同儿子哈立德下棋，她就数落我荒废了他的学业。假若我抱起女儿哈纳蒂，把她放到我的肩上，她说我这种游戏造成她上周肚子痛。我发现哈立德爱好诗歌，我便鼓励他读诗。她却说没必要让孩子失望，他有数学天分，如此，等等……

还有呢！一次又一次，斥责我，使我警觉起来：她究竟想要干什么？她想控制两个孩子吗？随便吧！你自己呢？为什么不去做点儿什么，更多地接近两个孩子呢？你不是整天整天不在家，待在报社或社会主义党部或出差在国外吗？你为什么为这点儿事责骂她呢？跟理发师有什么说的？……我一直在寻根问底，想寻找错误的根源，究竟是我的错还是她的错？这些与我们的离婚问题是否有关联？

我从汽车的反光镜里突然看见自己心神恍惚的面容，我吃了一惊。不！我不愿再是那个样子。在这美好的地方，在这充满阳光的早晨，我今天绝不再心神恍惚，不再为任何事情跟麦娜闹别扭。什么事都不想。不言不语地待在丛林中过几个小时。假若办不到，那就走。我启动了汽车。

当我进入宾馆大厅，记者会尚未开始。人们在大厅里摆了两张桌子，

拼成一个讲台，讲台后面摆了三把椅子。在大厅里摆了三十几把凳子。虽然只来了六七个记者，都一言不发地散坐在那儿。他们也许跟我一样，无事可做，所以就来了。谁让他们来的？谁在关注这一切？这样的会，由什么国际医生人权委员会主办，控诉智利侵犯人权，谁会重视？什么智利！什么人权！

什么都晚了，朋友！在恐怖笼罩之中，他们在首都体育场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人。阿连德已被军人杀了，挥泪的时间过去了。^① 三年前他们杀了阿卜杜勒·纳赛尔，他们反对纳赛尔，说他是独裁者。^② 他们为什么要杀阿连德？他是民选上台的嘛！狼对羊羔说：“假若你不是一个独裁者把水搅浑了，那么你就是个民主派也把水搅浑了。总而言之，你是我嘴里的肉，我该吃掉你。”现在谁还记得聂鲁达？^③ 十年前，军人篡权后，他死于忧郁。他的名字我从未在我国的任何一份日报上见到过。他们使他销声匿迹，不让他为自己辩护，不让他作诗吟唱，不让他说：“我的声音在全国的海岸线上飞扬，因为这是沉没者之声，每个不会唱歌的人，通过我的嘴唱歌了。”我年轻时读过聂鲁达的诗。他的诗刊登在我国许多报刊上，甚至晚报都刊登他的诗。当时的报刊都说，任何一个国家人民的胜利，都意味着我们的自由。我们曾经为恩克鲁玛哭泣，为卢蒙巴哭泣。开罗电台曾经为塞得港欢呼，为阿尔及利亚欢呼，为马来西亚等许多国家的人民欢呼。胜利的喜讯像鲜花一样盛开在屠场中心……是啊，不比屠场上的鲜花逊色！我记得我的一个朋友，读着下面的诗句，就泪流满面：“鱼群都在海洋里喝着咖啡，孩子们却在饥饿之中。”现在，已经没有人为了这样的诗句哭泣了。当我

① 阿连德（1908—1973），原智利总统。1973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以身殉职。以皮诺切特为首的独裁政权建立。

② 纳赛尔（1918—1970），埃及“七二三革命”领导人，后任埃及总统。

③ 聂鲁达（1904—1973），智利著名诗人，政治外交家，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著作有《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船长的诗》《西班牙在我心中》等诗集。

们这个世界上的有钱人把咖啡倒入大海，或者他们吞食堆成山一样的蛋糕时，谁也不会哭泣了。人们理智了，暴风雨过去了。人们只会在电视机前流下同情的泪水。其中，也包括你在内，伪善的人啊！你和国际医生人权委员会都一样……

我手中有一本小册子，它是摆在会议大厅入口桌子上的。我无意翻着小册子的内容，主席台上还是空无一人，开会的时间早已过了。我扫了一眼翻开的小册子。上面写着这样的内容：智利监狱中的行刑方式，正是该委员会以前散发的宣传品中曾经提到过的方式。它涉及智利、其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其他洲的一些国家。在智利最流行的是电刑：把活动的电源线头接到罪犯的身体上。罪犯被捆绑在涂了蜡的铁床上，电刑会给神经和肌肉带来剧痛。受电刑的结果会延续数年，它会造成人体肌肉的抽搐，使人长期失眠、做噩梦，使人陷入幻境而且始终摆脱不了第一次受刑的感觉和苦痛……还有名叫“针刺”的电刑……

听到大厅里有了动静，我就停止阅读小册子。我看见一个高个子、斑白头发的人坐上了主席台。他沉着地扫视了一下空荡荡的大厅，毫不感到惊奇，然后开始用英语讲话。从他讲话的语调，我猜到他是一位德国人或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他说，他名叫穆勒尔，是个大夫，对会议的延误表示歉意。他说将会说明会议延误的原因。他说他这个委员会包括来自各个重视人权状况的国家的大夫，都是志愿者。委员会特别关注医疗卫生方面的情况。委员会发现智利政治犯的情况很严重。这些犯人的数量有数千之多。接着他念了一些数字，说明监狱中病号有多少，刑罚有打骂、电刑、禁止睡眠、奸污等，还念了已经被折磨致死的犯人的名单……

我们大家开始发问，要求了解一些细节和更多的数字。突然，我认识的一位本地记者站了起来，他是《祖国报》的。《祖国报》曾连

续攻击来自智利和其他国家的移民，要求遣返或驱逐他们。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过许多文章，说这些移民造成国家人口拥挤、犯罪增加、环境污染，应该解救国家不受外来移民的危害。记者挑衅地问穆勒尔博士道：“尽管你说了那么多智利的情况，你不认为智利还是比许多别的国家安定吗？你不认为智利监狱中死亡的人数仍然比邻国死于内战的人数少得多吗？”

大厅里响起一阵声讨的嘀咕声。坐在我前排的一位女记者大声问道：“这次会议是否邀请了智利的将军们出席？”她的话招来别人的一些评论。穆勒尔博士用手指敲了两下桌子，平静地对《祖国报》的记者说：“先生，我不是政治家，我们的组织也不是政治机构。我们是大夫，只介绍一些我们调查的情况。不过我可以提醒你一下，智利政变前没有死什么人，既没有人在游击战中死去，也没有人在监狱中死去。所以，如果你愿意，应该对此进行一番比较。”

穆勒尔博士看看手表说：“对不起，我们租赁大厅的时间已到，已经一个小时了。我们还迟到了，因为我们准备给各位提供的证明材料的西班牙文稿出了些问题。”他指了一下前排，曾坐在他身边的一男一女站了起来。他接着说：“本来应该来一位专职译员，可是，他在最后一刻抱歉地拒绝了。另一位朋友伯蕾吉蒂·希弗尔女士提供了译稿，我感谢她。”

伯蕾吉蒂身穿一套蓝色制服，像空姐一样，脖子上围了一条玫瑰花苞的围巾，坐在博士和另外一位男士之间。她面露微笑，不太自然地对我们说：“我翻译得很慢，请大家原谅。这是我第一次做译员工作。”全场记者的眼睛都盯着她，她十分靓丽。有一个记者说：“我们会很高兴地原谅你，请你抓紧时间。”人们大笑起来。穆勒尔博士又敲了敲桌子，严肃而又近乎责备地说：“我刚才对大家说了，这份证明材料对我们组织来说十分重要，它涉及医务人员。我希望大家仔细听听。”

接着他示意那个男人开始说话。

这时，我把目光从伯蕾吉蒂身上转到那个男人身上。他坐在她的右边。我看不清他的脸。他低着头，几乎把头埋在胸前的两臂之间，甚至连他的一头黑发也看不清楚。他说话声音低沉，伯蕾吉蒂好像在提醒他大点儿声说话，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他仍然没有抬头，伯蕾吉蒂开始翻译。他每停一下，她就翻译几句。她用记者们通用的英语进行翻译。

他说，他名叫彼德罗·伊巴尼兹，三十六岁，是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出租车司机。年初的一天，他的车停在车站前的出租车停车场里，等着载客。他看见有个人走出车站，手里提着一个包，朝停车场走来。靠近他的车时，另一个司机迎了上去。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个人。这人指了指他的车，想接过他的包，但是遭到拒绝。“他不给这个人包，也不愿跟这个人走，反而朝着我的车走了过来，我的车离他最近。根据乘客的指点，我开动了出租车，同时发现另一辆出租车也尾随在后。”他认出了司机，正是那个想接包的人，他的旁边还有别的一些人，乘客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不断地往后看，显得局促不安，但是他仍极力控制自己的恐惧。彼德罗害怕了。乘客对他说：“快点儿！快点儿！”说话时眼睛时而盯着后面的车，时而看看前方。突然他对彼德罗说：“听我说，他们要抓我。他们是安全局的人。”彼德罗想停车让乘客下车，但又担心乘客遭遇不测，所以当乘客要他离开大道钻进岔道时，他听从了。彼德罗说，后来他后悔了，那是个坏主意。其实追车的人在拥挤的大道上，什么也干不了。可到了岔道上他们很容易地就盯上了他的车。彼德罗竭力想摆脱他们，可是他们的车新，速度快。乘客看出了这一点，不再往后看。他缩坐在座位里，沉着地对彼德罗说：“听我说，我很遗憾，让你卷入我的事中。”彼德罗不知他说的是什么事。但是，当后来的车在一交叉路口赶上来的时候，乘客突然打开车门，

跳了下去。他开始朝大街上狂跑，但是没跑几步他就倒了。他赶忙趴在座位上。他感到子弹已经击中了那个人，他摔倒在路上，头上喷出了鲜血。

彼德罗平静地叙述着，伯蕾吉蒂平静地把他的话译成英文。她双眼环视着大厅。我发现她的脸色铁青、声音逐渐高扬。彼德罗用手示意子弹射入体内的部位。穆勒尔博士以食指指指手表，暗示他们快些说。彼德罗歉意地点点头。他早已忘却了羞涩，抬头扫视了大家一眼，大大的双眼和双眼下宽宽的黑色眼袋，像倒置的双眉。这是失眠，我自言自语地说。

彼德罗的语气经博士催促之后有所改变。他的话脱口而出。伯蕾吉蒂跟不上他的速度了，她向大家表示歉意，有时还请彼德罗重复一遍。事情不那么连贯了，这一次他用手指指胸口说：“子弹是从这里进去的。我当然不知道那乘客是谁，有些遗憾。我的意思是说，子弹从腰间射入，留在胸腔里。医院的人是这么说的。在这个地方……但是，乘客在坐上出租车之前，我并没有见过他……我以为他已经死了，不，我肯定他已经死了，我亲眼见到了血，看到他的脑浆溅在了人行道上，然后才断了气……军官在医院里讯问我时，我口干舌燥，摇了摇手说，我不认识他。军官拔下了给我输血的针头，拔掉了给我输氧的管子，说：‘我会让你死！你是卡比底罗的朋友。那么多出租车司机，他为什么独独选了你？’当时，大夫就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目睹了一切。军官是安全局的……氧气管被拔掉后，我开始不行了，呼吸越来越困难。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卡比底罗的名字，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我兄弟也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当我想把这些情况告诉那位军官时，我满嘴都是血，之后就又昏死过去了。第二天我苏醒过来后，他们又开始审问我。那天有三个安全局的人，他们问我的家庭情况：‘你家里的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吗？是不是阿连德的党徒？……’我生于农村，但即便